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记忆



## “党史研究大有可为”

当年,陈列保管组职工人数不多,我属小字辈。年过半百的组长陈绍康于1955年从部队转业,来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,一直在此工作;他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积累,搞党史研究得心应手。头一天上班,老陈介绍了组室情况,我接茬:“刚才听说,在1961年8月13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贺绿汀的《游击队歌创作经过》,您就不失时机打电话,向贺老提出征集原曲

中共一大纪念馆外景



1951年冬,修缮后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外景



当年,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书籍

## “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”

随着事业发展,陈列保管组后分成两个组,即陈列组、保管组,均由老陈担任组长;不久,根据开展业务需要,保管组由陆米强担任组长。陆米强时年33岁,在1973年踏上文博工作岗位,大家习惯叫他“小陆”;他通过近10年的努力,已成为党史研究的后起之秀,向报刊提供过不少稿件。大概因年龄相差不算太大,我俩挺投缘,他多次对我讲:“从革命旧址可发掘许多感人故事。”

有一天中午,小陆拍拍我的肩膀:“你已知中共二大会址所在地点了,那里房屋还未征收。一起去看看吧。”寻抵上海成都北路(今老成都北路)7弄30号,他指着石库门说道:“当年,这里是李达寓所,中共二大第一次会议就在楼下客厅举行。”房屋虽饱经风霜,但基本保持原貌。他见我陷入沉思,便说:“告诉你一个信息,有材料称此处曾设最早的人民出版社。如想追踪,我们合作。”我与他击掌约定:“说干就干,这件事要尽快做好!”

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库房内,找到多本“广州人民出版社”出版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书籍。小陆认为:“这可能实际是由最早的人民出版社出版。”

经查,《新青年》月刊第九卷第五号(1921年9月1日出版)登载的《人民出版社通告》,在该社书目中列出“马克思全书”15种、“列宁全书”14种、“康民尼斯特(英文Communist音译)丛书”11种、其他读物9种,并表示:“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,研究的人渐渐多了,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,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,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”;1921年11月发布的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》则要求:“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,必须出书(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)二十种以上。”我国近代出版机构多称“书局”“书社”“书店”“印书馆”等,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筹建人民出版社,它在1921年9月1日已正式亮相,从此“出版社”名称逐渐流行;李达作为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,负责人民出版社顺理成章。李达的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提及:“‘人民出版社’由我主持,并兼编辑、校对和发行工作,社址实际在上海,因为是秘密出版的,所以把社址填写为‘广州昌兴马路。’这样,就真相大白了:那时,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,人民出版社为了安全,遂将书籍冠以‘广州人民出版社’名义,使敌人无法查禁。”

当年,陈独秀在《给共产国际的报告》中谈到,仅数月的时间,人民出版社就已出版书籍12种,各印3000册。据考,人民出版社共计出版书籍20种左右。我与小陆都从不同角度写了研究文章。

我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3年半,其间曾策划和执编第一本反映馆里职工研究成果的《上海地区建党活动研究资料》;还参与编写《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》。随着时间推移,自己终于完全明白当初老任以馆领导身份,两次亲自安排一个新职工“干活”的用意:进行磨炼,给予启迪。

后来,我奉调长期致力于新闻出版,但始终未与党史研究“脱钩”。我曾作为上海市政协委员,提交《关于切实保护、生动展示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的建议》《关于筹建中共中央在上海历史纪念馆的建议》等,受到重视。如今,中共一大纪念馆,由中共一大会址、宣誓大厅、新建展馆等组成;此次参观过专题纪念展,又一次进入“伟大的开端——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”厅时,内心非常激动:我永远是“一大人”,一如既往地积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……



1920年夏,李书城、李汉俊(后排左3、左2)与家人在沪合影



当年,新时代丛书社推出的部分书籍(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)



作者保存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证

# 我与中共一大纪念馆之缘

◆ 朱少伟

“初心照耀——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”正在展出。在“我们都是‘一大人’”展板看到了自己的名字,瞬间,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30多年前在馆里工作的一些往事。

## “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”

1982年底,我从复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。报到时,正值寒冬腊月,徜徉于太阳照耀下的树德里,却感到这条典型的石库门弄堂充满暖意;瞻仰中共一大会议室,重温建党光辉历程,更觉得眼前春光无限。

我成为陈列保管组一员,这是重要业务组室,负责陈列研究、文物保管。通过与老职工交谈得知,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征集、收藏了不同时期的大量珍贵革命文物,它的前身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成立于1952年初,下设中共一大会址、中央工作部旧址、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三馆;9月,基本完成复原布置,开始内部开放。我不由感叹:“这里也承担着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职能啊!”

时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、主持工作的副馆长任武雄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、浙江大学,后参加革命工作,抗战期间入党,于1957年担任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副主任,经刻苦钻研成为学者型领导,在党史研究方面有较高声望,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老任”。初次见面,这位56岁的著名党史专家热忱鼓励我:“年轻人要多努力,坚持不懈就会取得成绩!”

过了几个星期,老任交给我一项任务:“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,我党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作过坚决斗争,但一些史实需厘清。当年,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报道中应有线索。请查阅一下,并作摘录。”于是,我用了一个半月,把相关年份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全部翻查一遍,果然从这份国民党机关报中找到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内容。老任阅毕我梳理的资料,给予肯定:“辛苦了,搞研究常得甘坐冷板凳。”没想到,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的斗争(1924—1925)》长文发表时,老任让我也署名,他对初出茅庐者的真诚提携令人感动。

1983年夏,老任带我前往上海普陀区,登门拜望博闻强记的翻译家郑超麟。郑老早年曾在驻沪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,他多次接待老任,彼此熟稔。当老任问起中共四大开会地点,郑老因是会议记录员,他思忖片刻就回答:“当年四大会址是一幢石库门房屋,地点在上海市区通往吴淞的铁路旁边,不属于租界,而且离四川北路不远。会场设在二楼,布置成教室的样子……”郑老的叙述极有价值,我按老任的嘱咐记录得特别详细。

此后,本市相关部门派人访问郑老,并专程陪同前往实地踏勘,最终勘实上海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位置为中共四大遗址(原建筑在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)。我曾在《党史信息》报发表短文《“四大”会址位置找到了》,详叙原委。



“初心照耀——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”展牌